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郑升.《雪桥诗话》价值意义补论与重估[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4(5):103-107.

## 《雪桥诗话》价值意义补论与重估

郑升

(重庆工商大学 文新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雪桥诗话》的价值意义除学界已有论述,尚在以下方面有待重估:完备而又集中,且拾遗补缺的文献学价值;丰富诗话编撰体例及清诗批评样态,利于诗学歧说辨正的批评学价值;以诗话之体负载“一朝掌故之学”重任,在叙述各阶层人物中“见出人物学行功业”“情状风貌”和民族交融稀见史料的史学、心史价值。挖掘阐释这些特点和意义,对于完善或发现清代诗学史、批评史,建构多民族文学史观等学术和时代命题,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近代诗学;雪桥诗话;价值意义;重估

**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1)05-0103-05

《雪桥诗话》由清末民初著名旗籍学者、诗人杨钟羲撰辑,总计四十卷九千余则百万余言,为现存规模最大之诗话巨著,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八旗文史、清代文史的知名典籍,刊刻之时便颇受赞誉,如陈三立序赞:“留坨所为《诗话》,掇拾所及,比类事迹,甄综本末,一关于政教、学术、风俗,及其人行谊遭遇,网罗放失,彰阐幽隐,俨然垂一代之典,备异日史官之采择。”<sup>[1](P719)</sup> 缪荃孙序评:“此虽名诗话,固国朝之掌故书也。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直与刘京叔之《归潜志》、元遗山之《中州集》相埒。”<sup>[2](P5)</sup> 此外,钱仲联、严迪昌、张佳生、王佑夫、朱则杰、董文成、韩丽霞、靳良、李杨等当代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评介了《雪桥诗话》的价值意义。其中,雷恩海在校点《雪桥诗话》的基础上对其价值意义做了12个方面的概括:记述清一代掌故;记载英雄业绩;表彰良吏之清正高洁;揭露贪官污吏的卑劣行径和民生疾苦;各地名胜古迹、物产风俗、文化生活情景的记述;辑录了满清藩属国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史实;论诗论人,以诗传人,以诗存史;记载了诸多诗人之经历、事迹以及旧闻轶事;评诗论文,持论公允,而非出主人

奴,人言亦言;汇集并保存了大量现已为世罕知的佳篇佳句,许多作者因此而存名于史,特别是普通作者;论诗及人,论学及事,载录了颇多诗人、学者等各类文化人的旧闻轶事,许多涉及诗歌流派、学术源流方面史料;记载了大量的遗民事迹,保存了难得之史料。<sup>[3]</sup> 这是目前对《雪桥诗话》价值意义最为全面的概括论述。除此之外,若将《雪桥诗话》序跋、摘句及相关点评,以及杨钟羲自述或自注等结合起来考察,会发现《雪桥诗话》在以下方面所具有的特点或细节,有待重估和进一步挖掘:文献方面完备而又集中的特点;诗话编撰体例及清诗批评样态,诗学歧说辨正方面的价值;以诗话之体负载“一朝掌故之学”重任,在叙述各阶层人物中“见出人物学行功业”“情状风貌”和民族交融稀见史料的价值。本文试就此讨论,以进一步揭示《雪桥诗话》的本来面貌和意蕴。

### 一、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及特点

“欲存三百年乡邦文献”<sup>[1](P2869~2870)</sup>,为清王朝存史存人存诗,是《雪桥诗话》主要的编撰目的。在此之前,已有《清诗别裁集》《梧门诗话》《八旗诗话》《熙朝雅颂集》《八旗文经》《白山诗词》《晚清簪诗汇》

收稿日期:2021-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晚清民国新旧体诗话批评文献整理与阐释研究”(21BZW048)

作者简介:郑升(1979—),男,陕西宝鸡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诗学、散文批评和语文教育研究。

《清实录》《清史稿》等文献从不同角度从事类似工作。上述著述或限于清代某一时期,或文献与理论各有侧重,或时有疏漏错漏。从通史、文献与批评兼具且专力于八旗文史资料收集整理角度而言,《雪桥诗话》显然更为完备而又集中。完备在于其广收博取,“欲存三百年乡邦文献”,既有名家大家,更侧重于“山林隐逸”<sup>[1](P5)</sup>,许多正史未载或疏漏的诗人及其文学活动赖以保存;集中在于其“尤详于满洲”<sup>[1](P5)</sup>的撰述目的,类似宗室诗人名录及作品,“北方诗派”诗人名录及作品选录,顾太青等八旗闺阁诗人名录及作品选录,八旗官吏和布衣身份诗人诗作选录以及八旗诗人结社、雅集、唱和、论诗等活动和相应资料的选录等,都为后人研究八旗诗史、诗论、作者行实、文坛活动、思潮风尚,留下了重要线索和史料,其文献保存的民族性、通史性特点突出。

此外,《雪桥诗话》尚辑录了众多汉族、蒙古族、壮族、回族等群体的作家作品,诗评诗论以及结社雅集,八旗文士与汉族文士交游等文献,钱谦益、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毛奇麟、洪升、陈子龙、叶燮、吴乔、朱彝尊、龚鼎孳、王渔洋、赵秋谷、沈德潜、厉鹗、翁正岗、袁枚、赵翼、方东树、朱庭珍、魏源、龚自珍、张之洞、曾国藩、袁嘉谷、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陈三立、沈曾植、李详、刘承干、李跋以及“西泠十子”“京都十子”“关中三李”“河朔诗派”“辽东三老”“山左诗派”“岭南五子”“浙派诗人”“桐城派”“同光体”“南社”“超社”等清代重要的诗人、诗论家、流派、社团及其佳作、诗论均有撷取,其中不乏稀见史料,具有拾遗补缺的价值,如“关中三李”“河朔诗派”“辽东三老”“山左诗派”“超社逸士”等,又如《初集》卷六第39则记述梦文子侍郎行实及其别集目录、绝句情况,其中“《白山诗介》选其诗,较诸家为多,惟缺绝句一体,今为录数首以补之”<sup>[1](P326~327)</sup>的评述,明确点明这则诗话的诗学史价值;《初集》卷九第4则选录了《元诗选》等通行元诗选本所未载的数十首诗<sup>[1](P475~477)</sup>;又如《续集》卷一第95则“自来北岳诗较少,四诗可称杰作。季深绝句如《樵风泾》《惜红》”的记述<sup>[1](P771)</sup>,《余集》卷四第98则“曩辑《白山词介》时未之及,异日当补入”<sup>[1](P2404)</sup>等评述。

## 二、诗话编撰、批评学方面的价值及特点

相较《清诗别裁集》《熙朝雅颂集》《晚清簪诗汇》等诗歌总集,《石洲诗话》《随园诗话》《八旗诗话》《石遗室诗话》等诗话著作,《雪桥诗话》在编撰、批评学

方面有和而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其一,丰富了诗话编撰体例及清诗批评样态。

初集缪荃孙序值得注意:

史馆之实录,逐日排比谕旨,无首尾,无断制,不附大臣列传,与宋、明《实录》不同,《起居注》亦同,更不完备。大臣列传,内官至侍郎,外官至巡抚,无不立传,传亦录谕旨,节奏疏,一篇详履历耳。其人之学行功业,无所表见也。……杨芷姓太守,同寓上海,一日以《雪桥诗话》十二卷见示。自首迄尾,读十日而毕,曰:此虽名诗话,固国朝之掌故书也。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直与刘京叔之《归潜志》、元遗山之《中州集》相埒。<sup>[1](P5)</sup>

这段话说明《雪桥诗话》的编撰体例正好与通常的史馆实录相反,每集各有起止,从中可以看出所写人物的“学行功业”;而“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直与刘京叔之《归潜志》、元遗山之《中州集》相埒”,则揭示了《雪桥诗话》体例上的特色,即由诗及事,由事及制度,详于隐士和普通文士,尤其是满洲,具有诗史价值。

余集陈宝琛序中的一段论述则揭示了《雪桥诗话》评诗方面的特点:

综一代之诗,以纪一代之事,始于宋人计敏夫之《唐裔纪事》。本朝厉太鸿沿其名而小变其例,以编宋诗。近人复用太鸿例编元、明两朝诗。然名曰“纪事”,实则诗多而事少,若论诗而俨具史裁者,前人盖未有此体。子勤馆史以良史才出为外吏,政变以后,避地沪滨,以著述自遣,成《雪桥诗话》前后凡四编,都四十卷,每编自为起讫。自胜国遗民以至昭代名臣、硕儒、畸人、逸士,或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大率以诗为经,以事为纬。其最难者,如举一人之事,每拈举他人所赠诗以证其人之生平,此非博览而强记者不能想。<sup>[1](P2121)</sup>

陈论强调了《雪桥诗话》胜于前代及同时期纪事类诗话的地方,在于克服了“名曰纪事,实则诗多而事少”的不足,创立了纪事类诗话新体例,以及在纪事类诗话撰述体例和方法上有新变,即“若论诗而俨具史裁者,前人盖未有此体”。其中的“史裁”一词即指一个人对史事的裁断能力。《雪桥诗话》所选录的资料之间具有互证关系,作者往往对所辑录的对象

(诗人、诗作或诗本事)的特点、意义或效果有评价,而非简单的资料汇编。如《初集》卷三第71则记述竹枝词源流之后,杨钟羲通过评点指出:“都门人家于正月二十五日大啖饼饵,名曰填仓。此皆叙承平旧事,可录为《春明梦忆》。”点明所选诗作的主旨是“皆叙承平旧事”<sup>[1](P180~181)</sup>。《初集》卷四第70则列举了名臣、经学家、文学家三类当朝名流及其诗作后有如下评点:“格意不同,皆能自出机杼。其以世眼轻书客,至谓不读书不识字为豪杰者,非吾所敢附和也。”<sup>[1](P235~236)</sup>卷八第28则记述自康熙开始“逢腊月朔日”时开笔“书福”赠与王公大臣的典制,并录御制诗,末有杨评:“亦皆岁时之胜事,而梦华之雅谈也。”<sup>[1](P456)</sup>《续集》卷一第1则评《元夕》诗:“则易代之感也。鬼盟截句最佳,已见前集,兹复录其《燕京即事》四首。”<sup>[1](P721)</sup>第11则评韩经正《雨中送春》《九日》等诗:“含情绵邈,诗之以韵胜者也。”<sup>[1](P726)</sup>卷四第3则评西林相国《赠又上》诗:“其为人之高迈,可想见矣。”<sup>[1](P994)</sup>卷七第125则评:“刘楚桢经学名家,诗慕三唐……学人之诗,所谓无事模铸,自然声振者也。”<sup>[1](P1319~1320)</sup>《三集》卷六第98则评授衣《脚冷》《冬日过田家》诸诗:“出入白、陆,自觉清气沁人。”<sup>[1](P1704~1705)</sup>《余集》卷一第72则评江阴陶孚尹诞仙捡拾的诗稿“多苍凉沈郁牢骚激楚之音。《谒孝陵》云:‘临濠一剑终黄土,建业千山又夕晖。’《村社》云:‘粉榆社火原风俗,箫鼓巫阳自岁时。’《春夜》云:‘深院有人初度曲,绮楼何处更调笙。’盖鼎革时名宿,宜乎铜驼石马,感慨系之。而作者姓氏等于子虚、亡是之流。见所著《欣然堂集》”<sup>[1](P2163)</sup>。

这样的编撰方式与章学诚提倡史书需凸显“史义”的编撰思想有相通之处。换言之,到了《雪桥诗话》这里,每则诗话的编撰基本上是把人、诗、事、论有机结合起来,相互间形成一种发明、印证或解读的关系,特别是评论性的部分往往是就选录对象或介绍背景,或揭示主旨,或进行好坏优劣的价值判断,使得《雪桥诗话》不同于资料汇编、逸闻轶事收集一类的诗话,而是以“史裁”来写诗话,彰明显幽,以选示法,微言大义,蕴含审美理想与价值品评。这是《雪桥诗话》在纪事类诗话撰述发展史上的一个贡献。

其二,利于清诗史书写及诗学歧说辨正。

《初集》缪荃孙序云:

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

直与刘京叔之《归潜志》、元遗山之《中州集》相埒。即其论诗推重国初之朱、王、叶、沈,悉取正声,而不甚扬袁、蒋、赵之流波。郢说歧途,扫除净尽,于诗学亦甚有裨益。<sup>[1](P5)</sup>

依据语境,序者的原意是想说明杨钟羲“论诗推重国初之朱、王、叶、沈,悉取正声,而不甚扬袁、蒋、赵之流波”的诗学思想,决定他的诗话在涉及诗学分歧的时候,会有一个选择、判断和解释,所谓“郢说歧途,扫除净尽,于诗学亦甚有裨益”。这在各种思潮兴盛的清代诗坛,无疑具有明辨、示法、导向等作用。

《雪桥诗话》杨钟羲自跋称:

有未尽者,当俟续编,若夫网罗旧闻,整齐排类,为本朝一代诗史。与太鸿、秀野、蒙叟、锡鬯诸老之书相赅续,则以俟诸博雅君子。<sup>[1](P712)</sup>

杨氏明确表明自己编撰这部诗话旨在“为本朝一代诗史”,其撰述从晚明遗民诗人诗作诗评开始,直至民国初年,时间跨度大。跋中“与太鸿、秀野、蒙叟、锡鬯诸老之书相赅续”这句话,进一步点明诗话的特色及其有益于清代诗学史书写的价值。太鸿即厉鹗,《宋诗纪事》和《辽史拾遗》是厉鹗诗史性著述的代表作。秀野即顾嗣立,《元诗选》是其诗史性总集。蒙叟指钱谦益,《列朝诗集》是其诗史性大作,仿金代元好问《中州集》而纂集,旨在以诗存史。其编辑体例亦如元好问的做法,以诗系人,以人系传。每个作者的小传,介绍姓氏爵里生平,品评其作品得失,资料比较丰富。所选作品一般都属作者的代表作,间或有借诗以存其人的情况。锡鬯即朱彝尊,《明诗综》是其诗史性巨作,计一百卷,录存明初诗人至明亡后遗民3400余人的作品,并有作家小传及诸家评论,附有诗话。编者自述其纂辑意图是针对明代诗风屡变,选诗不一的情况,求全图备,搜罗各派诗歌、诗人,几乎无所遗漏,资料较为全富。其诗人小传也颇费斟酌,评论较为公允。此书还存有大量明末殉节之臣及遗民之作,并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状况,对研究明代诗歌风貌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综上所述,太鸿、秀野、蒙叟、锡鬯诸老之书的共同目的是存留宋、元、明各朝诗史,共同的体例是以诗系人、以人系传,间有诸家评论,并附有诗话,《雪桥诗话》正是要赅续这些前贤诸书的体例及精神。具体到文本,类似实例很多,如《初集》卷三第71则记述竹枝词源流<sup>[1](P180~181)</sup>;卷四第71则选录冶亭尚书《读乡前辈遗诗感赋十二首》,梧门祭酒《奉校入旗人诗集题咏五十首》,从中“见北方诗派之大凡,今



并录之,以资研究焉”<sup>[1](238~243)</sup>;卷九第21则详述本朝通“乐”者之著述及其渊源,选录次仲词集《梅边吹笛谱》词篇;<sup>[1](P489)</sup>《续集》卷一第115则叙述“云间派”及复社构成、发展等情况,录陈子龙诗作以及他人吟咏之作;<sup>[1](P784)</sup>《余集》卷四第95则记述“广南一代之诗略备矣”<sup>[1](P2402)</sup>;《三集》卷五第80则详尽记述本朝闺阁诗人及其代表作<sup>[1](P1693~1695)</sup>。

### 三、史学方面的价值及特点

《雪桥诗话》余集陈宝琛序有言:

海上十余年,露钞雪纂,其用力至勤且苦,而三百年中,世运盛衰,治术之升降,人才之消长,读此书举可窥其崖略。信乎一代之良史,而不当以诗话目之矣。<sup>[1](P2121)</sup>

陈序明确指出《雪桥诗话》具有“一代良史”的特点,具有管窥清代“世运盛衰,治术升降,人才消长”的重要价值。

陈三立序赞:

留坨所为《诗话》,掇拾所及,比类事迹,甄综本末,一关于政教、学术、风俗,及其人行谊遭遇,网罗放失,彰阐幽隐,俨然垂一代之典,备异日史官之采择。<sup>[1](P2121)</sup>

初集缪荃孙序言:

国朝文人,经学史学,均超出明人之上,独至一朝掌故之学,不如明人远甚。郑端简、王弇州固无其人,即纪载汇编之书,金声玉振之集,国朝亦无有也。史馆之实录,逐日排比谕旨,无首尾,无断制,不附大臣列传,与宋、明《实录》不同,《起居注》亦同,更不完备。大臣列传,内官至侍郎,外官至巡抚,无不立传,传亦录谕旨,节奏疏,一篇详履历耳。其人之学行功业,无所表见也。三品以下,则无传,十四传不全,十志亦不备。史馆如此,尚何所望。私家著述最为详实者,止钱坫石之《碑传集》、王文勤之《石渠余记》、吴制府之《养吉斋丛录》而已。杨芷姓太守,同寓上海,一日以《雪桥诗话》十二卷见示。自首讫尾,读十日而毕,曰:此虽名诗话,固国朝之掌故书也。<sup>[1](P719)</sup>

上论分别指出清代文人远逊明人的地方在于缺少“一朝掌故之学”,其次是官修史书有两点不足:一是“无首尾,无断制,不附大臣列传”,一是“大臣列传……亦录谕旨,节奏疏,一篇详履历耳。其人之学行功业,无所表见也”。这些恰恰是《雪桥诗话》的着力

之处,也正是它的特色和贡献所在。换言之,《雪桥诗话》以诗话之体负载“一朝掌故之学”重任,在叙述各阶层人物中“见出人物学行功业”,并非单纯枯燥的人物事迹汇集。这无形中丰富了诗话的功能和表现内容,客观上有利于诗话文体地位的提升。

同时,《雪桥诗话》中的掌故不但类型多样,涵盖面广,而且可靠性强,许多重大的、具体细微的典制或事件均有生动记述,其中不乏正史中难以得见的人物心理活动、情趣风貌和逸闻轶事,如出使琉球,收复台湾,平定三藩、准格尔叛乱,土尔扈特部迁徙、回归的遭际以及详细的路线图,征讨缅甸,木兰围猎,改土归流,治理江淮水利,管理青藏新疆,修《四库》,八旗官学,左宗棠收复新疆失地,太平天国及捻军等重大事件中人物情貌、事迹的记述;又如崇祯帝,朱三太子,谒陵,守陵,康熙南巡,千叟宴,清内廷建筑布局功用,顺康雍乾嘉庆诸帝王读书、起居、问政等细节,高宗春节前后手书福字赠送大臣们,冰嬉,缙戏,庙会,琉璃厂图书,指头画,金石分布,印章篆刻,玉石文物,《五客图》题咏,盛京物产,西域物产,回部婚姻习俗等细微记述。其中,《初集》卷四第5则详细记述了土尔扈特部回归的陆路、水路路线及沿线重要的地点。<sup>[1](P191~193)</sup>卷四第28则记文勤两使准噶尔,一在雍正十二年,一在乾隆三年,并录其《准噶尔歌》,其中有对准噶尔风物人情以及重要地理信息的说明:“乌鲁木齐者,番语种稻之所,因以名城。乌鲁木齐以番音切之,则得轮字,汉之轮台也。……阳关之西,有河名玛纳斯,其流甚巨,南带天山,北据瀚海,设关以此为险。”<sup>[1](P209~210)</sup>卷五第13则选录厉樊榭《使琉球记序》,保存了与琉球有关的历史资料:“皇清受命,悉主悉臣。琉球远在东南海中,冀霑宠灵,世为外藩,请封者至再。康熙元年,张侍御学礼,衔命以行。逾年归,著有《使琉球记》二卷,上卷言使事,下卷言风土也。尝镂版,岁久漫漶,曾孙宝善重授剞劂。琉球国贫而俗俭,侍御减供却金,中山久旱,册礼既毕,大雨三日。嗣是出使者,汪检讨辑则有《使琉球杂录》《中山沿革志》,徐编修葆光则有《中山传信录》,皆本侍御而增益其未备。”<sup>[1](P254)</sup>卷五第42则详细记述了准噶尔部落的分布、语言、发展、叛乱以及清廷三次平叛的过程,含行军路线以及沿途重要地形或风俗,如其言:“准噶尔本蒙古厄鲁特人,元置驼、马、牛、羊四部分,驻西北边。准,其牧马部也。今外藩四十九家,多元后裔。准噶尔语言字画,皆同蒙古,而讳言为蒙古人

……北路军粮岁取给于此。土默特部即明土木。大同城西三十里云西堡,有云冈寺,后魏拓跋氏建。归化城本名枯枯和屯,蒙古谓青为枯枯,谓城为河屯,译曰青城,盖因大山得……右皆方恪敏《从军杂诗》注中语。恪敏时以布衣投中书,为平郡王掌书记也。其末章云:‘畏吾儿部古缠头,烽火连城苦未休。愿掇蒲萄随汉使,年年瓜熟贡伊州。’注云:‘哈密,古伊吾卢地,唐改伊州,与畏吾儿、土鲁番皆为回回部。其俗以白氍毹缠头。自哈密西至土鲁番城八百里,又西约三千里,皆其境。土库察城、阿克苏城,凡十数处,一城多至万余家,其人循分务耕作,锦帛略如内地。产绿蒲萄,无核,味甚美。’”<sup>[1]</sup>(P278~282)卷八第28则记述自康熙开始“逢腊月朔日”时开笔“书福”赠与王公大臣的典制,并录御制诗为证。<sup>[1]</sup>(P456)《续集》卷二第59则记述了世祖之文治和勤政:“虚己勤学,手不释卷,数幸内院,与诸臣讨论古今。建直庐于景运门,令翰林官分番入直,以备顾问。……实开一代文治之先焉。”<sup>[1]</sup>(P851~852)类似例子,不胜枚举,《雪桥诗话》的史学、心史特色和价值可见一斑。

#### 四、余论

多民族交融而又多元一体是中国文学、文化演进的一个重要背景,一部完整的文学史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书写完成。清代的特性之一即在于以八旗为主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执政者对自身在文治武功方面的巨大期许和执政合理性的巨大压力面前,在数千年灿烂博大的汉文化面前和文化交融中逐步建立起师古与师心、自卑与自信的复杂微妙心理及其相应的文学、文化实践活动,共同导引满清统治阶层从建政开始便注意文化建设,巨大的成就与

教训并存。其前期强盛,后期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新旧冲突日显、中西文化冲突加剧,终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向解体,期间的沧海桑田留下太多丰富深刻的文学、文化和历史遗产,如何认识和评价,如何挖掘和阐释,以利于当下和未来,是一项有重要价值的课题。

就此而言,以更为广阔的视野面对旧与新、西与中,守正而又不拘一格,并在此视阈中关注那些常常被视作“旧”的个案,关注那些蕴含着丰富整体性、深刻性的个案,挖掘、阐释和建构,则许多既定的东西也许会有新的发现、认知和突破。回到本文所论议题,作为个案的《雪桥诗话》实则蕴含丰富信息,如民族交融、治国理政方面的信息,主流文士、文学、思潮与非主流文士、文学、思潮交融的信息,以及清末民国文化转型期各阶层在古今碰撞、中西碰撞之中刻骨铭心的种种体验等等,里面既关涉文坛与学界、个体与家国,也关涉民族与风俗、文化与历史,以及知识、思想与情感的演变,许多线索、史料的价值意义有待重估。通过阐发其中所蕴含的范畴、命题、事件、现象及背后的价值意义,可提炼出揭示出哪些具有特殊性或共通性的元素,这无疑对当下民族认同、古今沟通,完善或发现清代历史、诗歌史、诗学史、批评史,以及建构多民族文学史观等命题,具有积极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杨钟羲.雪桥诗话全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雷恩海.杨钟羲《雪桥诗话》学术价值述略[J].社科纵横,2012(1).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